

“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廖航

(湖北 武汉 430072)

2014年12月5日至7日,由武汉市人民政府、湖北省文物局和武汉大学共同主办的“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黄陂盘龙城经济开发区召开,来自中国、美国、加拿大的90余位国内外代表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共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49篇,议题广泛。会议期间,学者们就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盘龙城与中原等不同地区文化关联、其他地区夏商考古研究、以及器物制作工艺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现将本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作简要综述。

一、盘龙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为了配合盘龙城大遗址保护,盘龙城在经过了上世纪多次考古发掘之后,新世纪又开展了新一轮的考古工作。

近年来盘龙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收获,主要集中在杨家湾遗址和盘龙城城垣。2006年杨家湾杨家湾岗地南坡发现了一处编号为F4的大型建筑基址,年代稍晚于二里岗上层一期。由于基址保存较差,为了进一步探查F4的范围和布局,2013年,又在F4北面和西面进行发掘,并分别发现有与基址相关的灰沟,根据这些发现和F4柱坑分布、走向等判断,该建筑应该为西北-东南方向,其面阔约40多米,进深约10多米,基址规模、柱坑大小都与盘龙城城垣内发现的F1大致相当,建筑等级也可能接近。在对F4发掘过程中,还发现7座墓葬,其中M17、M19规格较高。M17随葬有镶嵌绿松石和金片的兽面纹饰件,是中原文化系统迄今

所见器形完整的、年代最早的金制品。M17还出土一件口似爵流,器身似觚,器釜似斝的青铜器,根据M17伴出爵、斝的情况来看,此器从组合上应该是作觚类器使用的。M19墓室较大,但随葬品不多,其中随葬的玉器有明显的碎器现象,玉戈断为两截,置于墓室中部,玉刀分为四块放置于墓室中部和西北角。一件玉器碎片被分别放置于墓坑和腰坑中,这是盘龙城墓葬中常见的碎器葬现象中的一种。配合盘龙城这类大遗址保护的考古工作需要一个多年的指导思想和规划。为此,2014年盘龙城遗址布设了三维控制网,能够对遗址范围内的遗迹、遗物进行精确定位。在控制网的精确定位基础上,通过对盘龙城遗址进行精确三维数据的钻探,可建立盘龙城不同时期的地貌模型,并由此观察盘龙城地理环境的变化。在盘龙城城垣及其城壕的勘探工作中,首次精确定位了城垣和壕沟的位置,为城垣复建和展示提供了考古依据。

未来盘龙城的考古工作,将会在配合大遗址保护和深化学术研究的背景下进行。张昌平先生提出可用测绘、勘探等方式廓清盘龙城遗址遗存布局及其年代变化,谈到接下来盘龙城的工作,一是会对已有资料重新研究,如盘龙城青铜器的生产地、陶器和印纹硬陶与中原的关系等,二是给大遗址保护提供考古工作支持。

对盘龙城的研究,年代分期、族属、性质等传统问题依旧是讨论的重点。盘龙城发掘报告将盘龙城分为七期,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年代框架,但学术界一直有一些微调的意见。此次

作者:廖航,武汉大学青铜文明研究中心

会议上,徐少华先生提出盘龙城最晚的遗物可晚至殷墟一期,也就是原报告的第七期还可分离出第八期。对于盘龙城族属,一般认为与中原二里岗文化属于同一族系。贝格立先生认为盘龙城出土与郑州二里岗相同或者类似的铜器,说明商人在这里建造城市,并带来了来自中原的各种工匠与技术。王劲先生注意到了盘龙城城址的建筑方法来自中原文化,认为盘龙城是商人向长江流域扩散的一个重要中心。不过,刘森森先生提出,盘龙城有相对独立的控制区域,虽然受到二里岗文化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差异还是相当明显,它的创造者应该是当地的荆楚民族。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盘龙城的性质一直有军事据点说、方国都城说等不同观点。在此次会议上,李伯谦先生就指出,长江中游地区文化在石家河文化后期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导致了自身文化的衰落,而盘龙城的出现,可能是由最初扩张的军事据点,逐渐稳定后形成的城市。张国硕先生从盘龙城人工建筑的防御设施和自然屏障的角度,提出盘龙城是具有军事重镇功能的商代方国都城。孙华先生则认为,盘龙城城址的结构和形态与郑州商城周围带城墙和大型建筑群的二级城址非常相似,是商王朝委派流官到地方进行管理的政治中心。无论如何,盘龙城的出现与商王朝经营南方有重要关系,是学者们的共识。

在对盘龙城遗存的研究中,郭明先生对盘龙城遗址商代大型建筑特点进行研究,认为盘龙城建筑的廊庑与主体殿堂不是相连的,檐柱外的擎檐柱、用碎陶片专门铺设的散水设置等都是盘龙城建筑区别于其他建筑的独特之处。郜向平先生在会议上谈到了盘龙城商代墓葬的特点之一,就是墓葬面积总体偏大,且以贵族墓葬为主,所出的青铜兵器较为突出,有较强的军事性。另外墓葬等级和个别葬俗存在一些差异,似乎意味着盘龙城居民内部有更细致的分群,是以小型的亲缘群体为基本社会单位的。陈树祥先生从盘龙城商代出土陶器、硬陶、青铜器、玉器等看物质文化内涵,认为其觚、爵、

斝的器物组合埋葬年代比郑州二里岗要早,且从这些器物的矿料来源看,盘龙城的一项功能就是对江南地区铜矿进行掠夺。

二、盘龙城与中原等其他地区文化的关联

盘龙城作为二里岗文化时期长江流域最大的城市,既和中原地区文化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又对长江地区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贝格立先生认为,长江流域制造青铜器至少开始于二里岗时期,可能正是因为青铜器制造技术扎根于盘龙城,然后才会传播到南方更远的地方,因此盘龙城是一个青铜时代早期文明向南扩散的基点。史可安先生则继续提到盘龙城并不是商文化在南方的唯一据点,铜陵和瑞昌等矿冶遗址也可能是其他类型的据点。他认为便利的水利交通、充裕的木材燃料、食物供给以及丰富的矿藏,将青铜铸造技术带到南方更多广大地区,在二里岗文化撤退之后,当地人学会了青铜开采和冶铸技术,并快速发展追赶上北方。

施劲松先生则提出以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这样的新模式来认知中心文化对周边文化的影响。知识体系指对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比如盘龙城的建筑工艺、青铜铸造技术等;价值体系指对观念的选择和判断,比如随葬品的组合方式、建筑和墓葬的朝向等。他指出盘龙城的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与商文化核心基本一致,可以看出其文化直接由二里岗发展而来;而南方其他遗址,如吴城与新干在知识体系上与二里岗文化较为接近,而价值体系则不太一样,说明其受地方土著和商人南下的双重影响。这样的比较可以说明盘龙城其实是商文化在南方本土化的一个类型。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与中原文化中心相反的观点。郭立新等先生认为从碳十四数据来说,盘龙城年代可能早到二里头一、二期或者更早,另外盘龙城的青铜器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要比郑、洛地区多,某些陶器形态在盘龙城更早出现,因此盘龙城应该是作为政治文化中心,向北扩张影

响到了二里岗文化。

盘龙城作为商文化在南方最重要的传播地点,对推进长江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饶华松先生从莽麦岭商代遗址出土的陶器、铜器等角度观察,发现其与盘龙城遗址出土遗物极其相似,其出土的一件盆形鼎与盘龙城王家嘴第6层所出的盆形鼎相似,所出的陶豆、陶鬲在盘龙城的第三期也可找到相似器物,这也许可以说明盘龙城类型商文化对赣北地区有极大影响。李昆先生从文明起源的要素,即城市、青铜器、文字等方面思考,认为盘龙城和吴城遗址都有城墙和宫殿、祭祀遗迹、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并且两者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刻画符号,这些丰富的考古发现说明,这两个遗址在长江文明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万娇先生通过对城洋青铜器群源流分析,认为盘龙城青铜器中的觚、尊、罍、盘、鬲与城洋青铜器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盘龙城铸造铜器的人群可能存在着一个流散的过程,其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流散至汉中地区。

三、其他地区夏商考古研究

未来的盘龙城考古工作与研究,多会放在一个大的空间视野下进行。此次会议中,部分学者也就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夏商时期文化展开研究。

许宏先生从中国古代都城形态讲起,认为从二里头时期开始直至西周时代,中国的邑都呈现出“大都无城”的状态,即都城不设外郭城,对外防御设施相对弱化,但二里岗时代的城址大多围以城垣,有极强的防御性,形成了特有的聚落景观。侯卫东先生提出郑州商城的布局大致可以分为内外两个单元,其由内到外的布局方式与殷墟的社会组织方式类似,可能由若干族邑组成,但目前暂时还无法区分出内、外城的准确分布范围。荆志淳先生对殷墟城市化进行观察,认为殷墟时期遗物、建筑的类型和风格经历了从繁杂多样到逐渐简单的过程,反映社会人群由开始复杂到后期稳定的逐渐转变;另一方面,殷墟非本地风格的陶器、

建筑等可能代表迁徙而来的外人,因此殷墟可能是以二里岗为主体,并融合多种外来因素而产生的。部分学者还从文化面貌等角度考察殷墟。岳占伟先生认为殷墟整个布局的方式是聚族而居、聚族而葬,殷墟文化第四期的墓葬在各个墓地中数量占绝对的优势,第四期的居址、手工业作坊区也发现较多,这些都说明殷墟即使在最晚阶段,仍然没有衰落的迹象,而应该是一个人口众多、繁荣昌盛的大都会。

一些地区近年的考古工作,给本次会议带来了新的资料。2014年济南大辛庄遗址发掘发现有水井、陶窑以及墓葬,还发现有与祭祀相关的建筑遗存,遗址出土物中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卜骨与卜甲,以及与铸铜相关的陶范、吹管、浇缸等,都非常值得注意。武汉大学近年对安徽古堆桥和台家寺商文化时期遗存进行了考古工作,两处遗址都属于二里岗上层到晚商偏早,古堆桥等淮河流域遗址多为墩台类遗址,面积虽然较小,但发现有建筑基址、铸铜等社会等级较高的遗存。台家寺遗址过去发现有龙虎尊等重要青铜器,今年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也与其社会地位匹配。

四、器物制作工艺研究

器物制作工艺研究是深化考古学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此次会议上有多位学者对夏商时期陶器,特别是青铜器的制作进行了细致的观察与分析。在青铜器工艺研究上,范制技术和连接技术是两个方向。

中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特征之一就是运用陶范铸造生产,围绕陶范和范型技术的研究,可以看作是青铜器铸造技术研究的基本方面。此次会议上,李永迪先生以安阳孝民屯出土的陶范为出发点,认为这些陶范与戴家湾和石鼓山出土西周早期青铜器特征相同,这样的现象可能暗示上述西周早期青铜器是在殷墟生产的,殷墟青铜作坊的运行有可能一直延续到西周时期。常怀颖先生指出当前学术界对于陶范、模上的“定位线”概念相对模糊,他认为定位线可控制翻范、合范、纹饰带以及范与

芯座的相对位置关系,确保陶范在脱模时使外范分割准确,此外也可以在浇铸时,避免外范组合在一起时可能发生的错位。陈建立先生认为,当从世界范围的角度看待金属技术起源问题时,可以明确冶金、陶范等技术最早起源于西方,而西亚地区和中国发现的采矿石锤、鼓风管、石范等与青铜器铸造有关的工具在形态和功能上都有相似之处。范铸技术是从西方起源并传播到了中国,而后在中国完成了本土化的历程。

连接技术是青铜时代早期制作器形复杂青铜器的重要手段。苏荣誉先生讨论了盘龙城青铜器铸接工艺的源流,他认为后铸铸接工艺是在南方地区发明并成为当地青铜器的一个重要技术特点,掌握后铸技术的工人后来到了安阳并使用这些技术铸造了殷墟青铜器。刘煜先生介绍了殷墟青铜器连接技术的

不同方式,并指出殷墟有与盘龙城相似的铆接技术,但这样的技术是不是起源于盘龙城,还不敢肯定。

正如刘绪先生在最后的会议总结中所言,本次研讨会呈现出一些鲜明特点。从参与人员看,与会的专家学者老、中、青结合,不仅有大陆、台湾学者,也有国外学者参与。从会议内容看,涉及到盘龙城遗址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遗址的分期、族属、性质、遗址的遗迹遗物,以及和其他文化的关联等,也有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器物的制作工艺研究、遗址公园的建设方法等。从研究方向看,传统的类型学分期研究较少,更多的学者从诸如器物的制作技术、文化的源流与交流过程等方面为切入点进行研究,这样的情况也许是未来考古学研究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